

香港文学概观

潘亚墩 汪义生 ● 著



鹭江出版社

香港 文学 概观

〔闽〕新登字08号

香港文学概观

潘亚敏 江又先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22.75印张 2插页 547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80533—940—6

I·170 定价: 16.00元

序

曾敏之

《香港文学概观》是潘亚瞰教授穷多年苦心研究的结晶，且有出版的机会，不能不由衷地为他高兴。

远在1978年，我曾在广东作家召开的创作会议上呼吁配合开放与改革，文学也应“面向海外，促进交流”。亚瞰兄是积极回应、促进文学交流的先行者。后来，我们为了研讨港台及海外文学，首先在暨南大学成立了港台文学研究室，亚瞰兄又是在研究中卓然有成的专家。80年代期间，先后在深圳、厦门、上海召开的港台及海外文学研讨会，他也曾躬身参与策划。可以说这些年来研究海外文学之蔚然成风，亚瞰兄有促进之功。《香港文学概观》就是春华秋实的回报。

值得称道的还有亚瞰兄勤奋研究的作风。

为了深入理解、探讨香港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他以得天独厚可以亲历香港作实地考察的条件，不惮搜集资料之烦，不辞奔走之苦，遍访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充分掌握了香港文学的脉络之后，采取如名医“望、闻、问、切”的方式，把香港文学与作家的风貌，力求准确地描述出来，形成了具有文学史与创作论综合为一的著述。我从他的著述中，体认到有许多特点——

对香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份，能从史观的角度，凭藉充分的史料作出客观的、辩证的评述，以事实否定了“香港没有文学”、“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无稽之论；

以纵深的研究，论证了香港文学发展的轨迹，并揭示了民主进步的传统；

广泛地接触作家，不论是30年代的老作家，还是如他所说的近期“南来作家”，把他们的沧桑经历、作品风格，一一加以剖析与描绘，于是构成了色彩缤纷的香港文坛的可喜景象；

对文学流派、品种、体裁兼收并蓄，不加轩轻，重其功能，彰其表现，反映出相互借鉴的作用；

不囿于政治偏见，能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强调的德、才、识三者兼备的史笔，评鹭作家作品的得失，以及香港文学存在的局限性。

根据上述特点，足以说明亚瞰兄的学养、潜能是可佩服的，在他孜孜不倦的研究过程中，可以预期他对推动海外文学的发展上会有进一步的贡献。

香港，正处于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正确认识香港已成为当前急务，文学是反映并表现社会的，香港文学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赋有反映、表现香港的机能。所以《香港文学概观》有如一把钥匙，有助于启迪对香港的认识，有助于香港与祖国的沟通。

亚瞰兄的治学，正如他自己描述的：“我独寓一室，精力集中，日夜兼程，行动快速，随心所欲，无后顾之忧，可以自由驰骋”，可见他具有韩愈“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的精神。但是由于亚瞰兄“下笔不能自休以为文，心存忠厚以立论，难免有粗疏、溢美之处。不过话得说回来，知人论世衡文本来不是容易的事，古代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就说过：“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

也。”可见属文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香港文学概观》是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瑕不掩瑜，绝不影响其价值。承亚曦兄不弃，囑为短序，因聊举所感以报命。

引 言

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时空，诞生于这特殊地域和时空中的香港文学，也有其特殊性。要搞清香港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就有必要先对香港的发展历史及其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作一番概略的探讨。

一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原属广东省东莞县，后划归宝安县。这个原只有5000人口的海岛渔村，过去是海盗出入之所。1941年英国强行占领香港后，同一天宣告香港为自由港。所谓“自由港”就是实行贸易自由、企经自由和汇兑自由。当今号称世界三大自由港为美国的旧金山、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中国的香港。而香港是其中最自由、最开放、功能多、能量大、多国多方都获利的最负盛名的自由港。

打开世界地图，看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香港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黑点。然而，100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香港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飞快地冲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由一个昔日寂寂无闻的南海小渔岛，发展成现代化、多元化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①一书，概

括了香港奇迹的几种主要表现，

“一、香港自然资源贫乏，却富甲一方。香港土地贫瘠，矿藏稀少，却拥有大量经济资源（资金、人才充足，信息灵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二、香港体积很小，能量却很大。香港只有1074平方公里和581万人口，而它在国际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比一些面积和人口多于它几十倍的国家还大。”“三、香港是英国人当作‘殖民地’来统治的地方^②，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自由。”“四、香港竞争剧烈，却容易赚钱。香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国际资本争夺市场的搏斗虽然残酷，但投资回报率很高。”

香港发展经贸有诸多优势：诸如港阔水深，四面环山，是个天然的避风港；二战以后一直保持稳定繁荣；有强大祖国为后盾，长期以来得到多方面的支援，与内地的贸易就占香港外贸65%；地处亚太地区的中心位置，交通四通八达，是世界海运交通的重要通道，航空亦然，为世界航线的枢纽之一，时差条件对它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十分有利，为24小时连续运转的接力点；占人口98%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在十大香港财团中，中国人占了7家（李嘉诚、包玉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陈曾焘、邵逸夫）；实行科学管理，注重市政建设，无天灾，等等。拥有上述因素，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轻工业、航运、旅游、信息中心，文教出版事业极为发达。香港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8种产品出口值或出口量名列世界第一（成衣、毛皮服装、玩具游戏机、手表成品、收音机、电筒、手提照明灯、照相机和钟成品），1989年，外贸产值高达1133291亿港元。它还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大量投资。香港的文化设施也是丰富多彩的，所谓“文化沙漠”，是不切实情的。

二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之誉，举世赞美这座美丽的国际名城。香港不是天堂，也非地狱，是个多层次多结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香港文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100多年来的史实告诉我们：香港是个洋华杂处的社会。少数人挥金如土，多数人克勤克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寸土万金，穷奢极侈，社会风气不好。

香港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高度商业化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的社会风气，人际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情薄如纸，唯利是图，铜臭熏天。自由竞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毒化了整个社会。所以说这是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多元的美丑参半的现代社会，一场场无形的战争时时刻刻席卷社会，一个个黄金美梦困扰着人们。

香港是个藏龙卧虎的社会，凡开拓者最敢冒险，最能拼搏，最善钻营，也最富创造精神。百多年来，大量造反者、叛逆者、逃亡者、落难者和亡命之徒聚集在这里。他们大多是冒险家、投机商和勇敢分子，其共同特点是聪敏机灵，勤奋武勇，有胆有识；或铤而走险，或忍辱负重，或出奇制胜，或为非作歹，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在这自由世界里，风云际会，变幻莫测，时沉时浮，毁誉荣辱，千变万化。有的偶发致富，洗心革面，弃恶从善；有的沉沦深渊，自甘堕落，形形色色，不一而是。时至今日，培养出大批奇才、怪才、鬼才、歪才、奴才和天才，真是人才济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令人叹为观止。行行出状元，处处出黑帮；一方面精英荟萃，一方面歹徒麋集，蔚为奇观。

香港是个知识爆炸的社会，这里报社林立，书店报摊密如蛛

网，电报、电话、传真畅通世界各地，信息极灵，科技发达。知识带来文明，科技带来进步，人才带来财富，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带来繁荣昌盛，法治的自由港吸引了全球的财富，于是港人有了信心和希望，产生了自爱、自尊和自强，追求荣誉与幸福、效率与享受。更因历次革命运动的洗礼，日据时期的黑暗统治，使港人记忆犹新，饮水思源，特别是新中国的胜利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港九同胞的爱国热情，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更使他们热爱伟大的祖国、民族和乡土，热爱5000年来的传统文化、美德与习俗，其中尤以文化人为甚。他们历来忧国忧民，坚韧拼搏，自强不息，有教养，有学识，有卓见，一专多能，愿为祖国效劳，支持内地改革，盼望十亿神州繁荣富强，好让海外赤子扬眉吐气。著者经考察认为，香港的光明面已逐渐大于黑暗面，特别是跨入80年代以来，知识青年的民族使命感尤其强烈感人。

香港发展史表明，在这贫瘠的土地上，香港文学虽然草苗争长，斑驳陆离，发展缓慢，历经挫折，但随着社会的演变、时代的进步和回归的日近，已逐步走上健康、进步和繁荣的道路，前景是无限光明灿烂的。

三

追溯香港的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古百越民族的原始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郑季屋村留存至今的汉墓、屯门山保存的杯渡驻锡遗址、宋朝邓符协卜居锦田创设的力瀛书斋的史迹，这些都清楚地表明香港文化是2000年来中原华夏文化的向南延伸。由无数历代文人凭吊宋王台的咏叹，到近代新界民众抗击外来侵略所留下的许多文物中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传

统贯穿于香港文化的发展史。至今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望夫石、香姑、红香炉等许多美好的传说，以及粤讴、蛋歌等民间曲调，都表明民族文化的底蕴深厚地沉积在现实的河床里，空间隔不断，时光淘不尽。

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成为东西方文化融通的城市。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当局统治的本质是“同化”，就是力图把殖民者“祖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灌输到殖民地的原居民头脑中，这就决定了殖民当局必然会采取漠视、压抑本土意识的态度。然而，香港大多数居民是华裔，加之毗邻祖国，香港文化不可能脱离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面对着这种一中一西潜在因子，香港文化既有所吸收，亦有所抗拒，二者之间的矛盾和融合，就形成一股本土文化潮流滚滚向前的内在动力。

到了近代，香港成为文化先驱“睁眼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太平天国时期的王韬、维新派人士胡礼桓、南社诗人潘飞声等先后到过香港，他们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和社会。到了本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盟会成员黄鲁逸、郑贯公、黄世仲、谢英伯等在香港陆续创办了《中国日报》、《有所谓报》、《广东白话报》、《小说世界》、《中外小说林》等报刊杂志。因地利之便，香港的近代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香港文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现代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大河中不可缺少的一条支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地和处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在社会制度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加上香港的新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频繁地往来于内

地与香港之间,文学书刊更是相互流通,没有划分什么界限。可以说,当时的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的文学连成一片,并不存在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独立于中国新文学之外的香港文学。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种种原因,在英国殖民当局占领下的香港就与祖国处于暂时隔离的状态。香港的文学也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了自己的特殊形态,同内地的文学主流有着明显的差异。应当指出,1949年以后的香港文学,仍然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用中国的语言文学创作出来的,所反映的主要是中国人的生活,更何况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切断,特别是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和内地人民、文学工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因而,当代香港文学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形态的组成部分。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不能相提并论。香港回归在即,香港文学当重于沟通融合以求“共通”,而不是分离。

四

香港著名学者作家梁锡华在《想一想香港文学》^③一文中对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如下结论:“香港文学的起头,是拜大陆南来知识分子之赐。”又说:“把香港文学(中文)的大旗扯起,并且迎风把它扬得猎猎作声,是近年的事。”“香港文学是叨了中国政策转变之光,才有今天的地位。……香港文学以至台湾文学,若缺了中国方面的提携,要打进世界文学市场颇有困难……”这是十分精辟的结论。

由于偏处一隅,远离当时的革命中心,香港新文学起步较

晚，发展缓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之下，经过鲁迅、胡适、许地山、茅盾等南来作家披荆斩棘，拓荒播种，后又经侣伦、杰克等本土作家的惨淡经营，香港新文学荒园里终于出现片片绿洲。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作家涌入香港，由此掀起第一次文化高潮（即1939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日，南来作家北归，文坛再度沉寂。抗战胜利后，数以百计的作家再度来港，香港文坛十分活跃，出现了第二次文化高潮（即1946年—1949年）。据香港作家、文学史家小思的统计，30年代中叶至40年代末，“知名的文化人来港的超过二百”。^④经过两次文化高潮，在南来作家培养和影响下，香港本土作家开始成长，具有本地特色的香港文学也随之萌芽。香港新文学时期，涌现了黄谷柳的《虾球传》为代表的一批佳作，成绩喜人。但从1920年以来的前30年的文学活动，都为南下作家所发动和领导，又因时值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上，无暇顾及香港本土文学，以致人来则兴旺，人去则沉寂，并未扎根开花结果。人称香港新文学是“移来的花果”，此言不无道理。本时期的香港新文学，准确地说应该是“香港的中国新文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香港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从国内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大多见不到香港新文学的地位及其在整个新文学史上的影响。我们只是在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⑤中，看到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的香港文艺运动作了评介。著者认为，香港新文学对抗战前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新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应低估的。

从1950年以来的40多年，香港起了根本性变化：一、新中国诞生后，大陆与香港社会制度有着本质不同。由于长期以来极

“左”思潮的干扰，夸大了两种制度的差异性和敌对性，错误地把香港视为“大染缸”，而忽视了都是龙的传人这一最大的共同点，以致伤害了骨肉同胞的乡土感情和爱国热情。二、由于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实行对华禁运，港英追随于美国之后，50年代初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如驱逐爱国侨领黄长水和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等人，关闭我进步文教机构，等等，致使香港越来越脱离母体，重英文轻中文，诱使华人全盘西化。随着通讯事业飞速发展，香港文学产生了很强的外向心态，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出高度的兼容性。也由于我们政策失误，封国锁边，少了亲感情和乡土谊，文艺界从此少了交流，甚至中断了联系。三、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文化人纷纷返回内地参加建设，后来多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辱，历尽磨难，使港人闻之寒心。而内地大批“落难文人”、右翼文人于建国前后蜂涌流入香港，在香港美新处的支持和美元的扶植下，香港报刊出版社林立，几乎垄断文坛和出版界，左右两方力量突告悬殊，一时反共声浪鼎沸，不仅席卷港岛，而且波及海外华人社会，于是整个文坛主潮向右转。台湾此时反共文学甚嚣尘上，对香港文坛向右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自50年代初以来，香港本土居民激增，而且人口流动性逐步减少，港人开始形成了独特心态、性格和意识形态。从香港人口上看，1949年200万，1959年300万，如今已达581万。从经济发展看，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末80年代初空前繁荣稳定。从政治上看，由“左”向右转化，恐共心理严重。于是，香港文艺界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脱离母体而日益西化。

70年代后期，大陆结束了10年动乱，随之而来的“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对香港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大陆现实主义文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和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对香港文学产生很强的冲击

力。自1980年9月《新晚报》召开“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之后，“香港文学”一词正式提出，并引起研究者兴趣。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进入了重要的过渡期。“九七”问题的出现，推动香港文学走向勃兴。王仁芸在《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⑥一文中认为：一九九七对香港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契机：“一、一九九七问题打破了香港与中国多年来的隔阂。……把香港的命运联系到中国的命运上，将是香港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二、一九九七除了促使香港作家关注中国外，也促使他们关注香港的现实。”“三、一九九七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冲击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进入过渡期的香港文坛出现了可喜的现象。长期以来由于不同思想倾向和文学流派而形成的各种壁垒和小圈子逐渐被打破，许多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作家，开始坐到一起，共同探讨香港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问题。许多文学刊物都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方针，接纳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老作家黄思骋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展望。过去的，无论成功、失败，都已成为过去。希望我们以前‘左’‘右’分清的情形，现在不再存在了。现在大家都无所谓左右了。大家都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未来，实在是没有界限的。”^⑦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广大香港作家的共同心声。进入过渡期的香港文学，从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也出现可喜的现象。一些长期拘泥于传统的写实主义方法的作家，在他们的近作中也开始注意吸取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一些热衷于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则开始将艺术视野投向现实社会。香港过渡期文学头4年在转折中勃兴，在过渡中繁荣。自1989年起，又出现滑坡现象，与香港经济腾飞速度相比，香港文学实绩很不相称。

如上所述，从1920年至1949年的前30年，为香港文学的拓荒

萌芽期，从1950年以来的40多年，为成长茁壮期。后40多年大致以10年为一期，即50年代为左、右两派壁垒分明的对抗期（即反共与反蒋文学相对抗）。60年代为缓和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平共处；70年代以来为横向交流期；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过渡期，出现了第三次文化高潮。1950年以来的40余年间，香港文学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既有别于大陆的文学，有别于台湾的文学，也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因之在海内外华文文学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具有香港自身特色的香港文学的产生，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自5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本土作家崛起，由大陆南来的“落难文人”也逐渐适应、熟悉了香港，纷纷将笔触对准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于是，相继出现了反映下层社会小人物悲苦命运的“乡土文学”，暴露资本主义商业都市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种种阴暗面的“都市文学”，以及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现代派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使香港文学呈现前所未见的驳杂色彩和鲜明的地区特色。伴随着经济贸易交流，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艺形态也纷纷涌入，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地理位置，香港又与台湾以及五大洲华人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它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汇集之地。香港作家频繁地出外旅游，海外华人作家频繁地出入香港，异域的风俗人情构成了香港文学的一大特色。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中介地点，它在疏通、联系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方面起着唯它独有的特殊作用。

五

香港文学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严肃文学，二是通俗文学，三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文学，严格说只有前两部分，是以

香港文坛历来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争。

文学史家素来重严肃文学而轻通俗文学，而广大读者却往往持相反的态度。在香港严肃文学中，基本上有两大流派，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接受内地文坛影响。这一流派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反映下层市民的苦难和抗争，暴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现港人的信心和希望。其中廖一原（笔名俞远）的思想小说《思前想后》和《峰回路转》姐妹篇，曾出过14版，一纸风行港澳和东南亚各国；再如吕伦的《穷巷》和舒巷城的作品都广受欢迎和好评。后因内地文艺政策一再失误，香港现实主义作家深受极“左”思潮困扰，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思想较保守，写法较陈旧，甚至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曾一度脱离香港实际和广大读者。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从框框套套中解放出来，有所突破创新，佳作迭出，成绩可观，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步扩大加强。

现代主义作家大都学贯中西，较多吸取外国文学营养，与台湾文学有较多联系交流，少受政治干扰，比较尊重艺术规律，讲究艺术技巧，追求艺术质量，勇于探索、实验、创新。虽一度迷误，有过欧化倾向和为“艺术而艺术”，犯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错误，却少有台湾现代派专讲“横的移植”的偏颇，有较多的“纵的继承”。例如老作家刘以鬯倡导现代主义，首先用意识流手法于其代表作《酒徒》之中，获得成功，成为香港文学史上一座丰碑，蜚声海外。诚然，现代派中也多小圈子，有学院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脱离广大读者。也有醉心于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一味迷恋扭曲、变形的畸恋的描绘，逃避现实社会，晦涩难懂，冗长乏味，语言破碎，外文、粤语掺杂其中，不中不西，甚至在梦幻中讨生活，在意识流中打转转。凡此种种，纷繁复杂，到了80年代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